

营口文史资料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营口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一月

目 录

关于伪满时期盖县《星火》社活动的回忆……	门文东 (1)
忆盖县爱国文艺事件……	铁 汉 (17)
田贲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	王耀华 (24)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	刘芝禄 (32)
大平山战斗的回忆……	孟庆宣 (50)
鱼水情深……	孟庆宣 (54)
抗日义勇军攻打营口概略……	于阜民 (59)
“九·一八”事变当时盖平县的地方情况……	叶剑忠 (66)
伪满大兴公司……	王耀华 (71)
鲁穆庭传略……	陈志新 (73)
迷镇山娘娘庙祭及“五大圣会”……	张永夫 (90)
李竹筠与《自怡轩印谱序》……	张永夫 (98)

关于伪满时期盖县 《星火》社活动的回忆

门文东回忆 门熙鼎整理

这件四、五十年前的往事，尽管相隔岁月已久，但每每回忆起来，仍是记忆犹新。那时《星火》社活动的情形，至今还是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甚至一些《星火》社同人的音容笑貌，也能清晰地浮现在脑际。每当我对往事和故人追忆起来，心情总是久久地不能平静。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沈阳北大营事件，把它侵略的魔爪伸进了我国的东北。不到三个月，侵略者的铁蹄就踏遍了整个东北三省。我们古老富饶的盖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盖县的父老乡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沦为“亡国奴”。然而我们盖县的人民和全东北以至全中国的人民一样，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十四年中，始终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盖县人有的参加了辽南地区反满抗日武装邓铁梅部队；有的抛家弃子奔赴长白山参加抗日联军；有的流落到关内最后到了延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战争，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为中国人民，也为盖县的家乡父老及子孙后代立下了功劳。

我们《星火》社的同人，虽然没能毅然走向武装抗日的道路，但也同样有一颗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之心。我那时在盖县天台街的馥馨香铺当会计，渐渐地接触认识了一些爱国青年。于家麟和我住在一个院，他家是馥馨的股东，我俩接触机会较多。他于一九三三年从盖县西关中学毕业后，由于对日伪不满，就没有参加任何公职，闲居在家进行自学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经常给《大同报》、《新麒麟》和《营口新报》等刊物写稿，流露出反满抗日的情绪。那时我们天台街还住着几个爱国青年：王克范和我住对面屋，他是盖县永安屯小学教员，后来搬走了；我们的对门住着一个青年叫张克恩，他是伪盖县兴农合作社的仓库保管员；在我们后街还有一个青年叫王锡成，他是营口一家汉药店的学徒。他们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由于居住邻近，我们就经常往来。接触多了思想就有了沟通。于家麟常向我们讲些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汉奸的罪行，讲当时的社会形势，讲青年人的抱负等等。并经常借给我们一些进步的书看。如巴金的《灭亡》，高尔基的《母亲》，还有鲁迅的小说、杂文等。这样，在盖县天台街就形成了一个以于家麟为核心的小团体，经常地有目的地聚集在一起，议论时事，揭露日伪的罪恶，抒发我们的愤怒心情，表达我们的反抗情绪。并且传看进步书刊，写文章，进行反满抗日的活动。

与此同时，盖县熊岳镇孤家子村的爱国知识青年花喜露，从省立海城第三师范毕业，回到盖县熊岳镇归州小学教书。他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传播爱国思想。在花喜露的启发教育下，高年级的

学生成立了读书会，办起了《春潮》、《飞浪》等进步校刊，开始宣传反满抗日的爱国思想。这样，在花喜露的培养下，一批爱国学生成长起来了。如孔庆举、刘永良、王风云、段树贵、崔殿久等，后来都成了《星火》社的骨干。

一九三六年夏天，花喜露（笔名田贲）和于家麟（笔名駝子）等由于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而相识了。在花喜露、于家麟的倡议下，有一天我们聚集在天台街东边的双顶山上，召开了一个同人会。当时聚在一起的人有花喜露、于家麟、王克范、李光海、王锡成和我。大家坐在山岗上，毫无顾忌地开怀畅谈起来。大家都很激动，发表议论，交流思想，各抒己见。从青年人的责任谈到今后应该怎样活动，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汉奸特务的种种罪行谈到沦陷区被压迫被奴役的同胞的苦难。个个慷慨激昂，争先恐后地列举了各自耳闻目睹的日寇和汉奸的种种罪状。现在回想起来，尽管记不清当时谁说了些什么具体言语和具体事例，但那种热烈的场面和大家的激动情绪，却是不能忘怀的。最后我们研究了下一步活动的打算。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应该联系更多的社会进步青年和高校的进步学生，要团结起来共同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当时我们决定：首先要有组织地传递借阅进步书刊，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并联系更多的进步青年；还要加紧进行文艺创作，宣传反满抗日思想，鼓动人们的反满抗日情绪；并且决定大家要分别寻找抗日的地下组织，以便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就在这次集会上，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同人性质的社团，油印秘密的刊物，发表一些在敌伪报刊上不能

发表的更犀利更明朗的反满抗日的文艺作品。我们就以这个同人社团和这个同人刊物作为联系更多的同人，进行更广泛的活动的基地。大家一致推举花喜露作主编，利用他们学校有油印工具的方便条件，定期出版刊物。这第一个刊物的名字，经过大家反复议论，最后确定叫《行行》。取《古诗十九首》中“行行复行行”的诗句，意思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这个刊名很不好确定，即不能锋芒毕露让敌伪特务嗅出革命气味，也还要有深刻的意义，所以最后才定下了这个刊名。当我们几个人惬意地走下山岗时，已经是黄昏过后了。

《行行》这个同人刊物，我们办了二年之后，扩大了影响面，联系了更多的爱国同人。如当时的盖县一高学生张吉宽、刘永良，辽阳一高学生石岱宗，奉天第三女中学生王丹群，营口商学校学生孔庆举，盖县女高学生穆玉琪等等，都成了《行行》社的同人。这时花喜露、于家麟又提议，为了能更多地发表一些《行行》同人和青年学生的进步作品，再印行一本刊物，起名叫《星火》，表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以喻我们的反满抗日活动虽然力量很微弱，但终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取得最后胜利。从此《行行》同人社就改为《星火》同人社了。

这个时期，我们《星火》社同人虽然还没找到地下组织，但已能从间接的途径得到些中国共产党印行的刊物和材料，受到了党的影响。当时营口地区也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在进行地下抗日活动，他们的思想也影响到《星火》社的同人。以花喜露为一方的一些《星火》社同人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要走苏联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以

于家麟为一方的一些《星火》社同人则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要走三民主义道路，因为中国经济还不发达，比不得苏联，只有先走三民主义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碰到一起也常常由议论发展到争论，甚至有时争论得很激烈。但是最后的结论，又总是归结到反满抗日这个统一的目标上来。所以我们《星火》社同人始终是团结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疯狂地向我国关内大举进攻，一面在东北地区强化殖民统治。实行并村并屯，保甲连座；又征兵抓人，实行白色恐怖的法西斯统治。我们《星火》社同人，并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所吓倒，相反地活动更积极了，组织也不断地发展扩大。花喜露、于家麟等好多《星火》社同人，除了在我们自己办的《星火》油印刊物上发表文章，还经常地在一些日伪刊物上发表文章。当时的《大同报》、《盛京时报》、《大北新报》、《新满洲》、《地平线》和华文《大阪每日》等，都经常有我们《星火》社同人的文章。因为这些刊物的内部已有了我们《星火》社的联系人。花喜露的《孙二祖宗上西天》、《幽静的山谷》、《荒城的故事》；于家麟的《寂寞的城》、《小驿》、《我底歌》；我（笔名铁键）的《卖草妇人》、《贼》；王锡成（笔名夕澄）的《缝穷的姑娘》、《马路上的落叶》；郁其文（笔名铁汉）的《生之牧鞭》、《青春难驻》；疆匹的《年代》、舒啸的《雷雨》、臧晶的《孩子们别了》、华青的《出走》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发表在上述刊物上的进步文章。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的进步作品就更多了。鲁迅的作品，茅盾的作品，巴金、

老舍的作品以及更多的苏联作品，在我们《星火》社同人中广为流传。这时花喜露、于家麟、王克范（笔名矜人）、李光海（笔名铁励）和我们研究，把《星火》同人社作为“鲁迅文学研究社”，对内自称“LS文学研究社”。进一步研究革命文学作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事迹，我们知道得更多了，我们的斗争热情受到了鼓舞。有时于家麟、王锡成、张克恩和我晚上聚在香铺的柜房里，一唠就唠多半夜。另一些《星火》社同人李光海、王克范等也经常到香铺来和我们会面，传递书刊、传播新消息。

一九三九年秋天，花喜露、于家麟等《星火》社同人，通过写文章结识了《营口新报》的副刊编辑王觉（后来知道他是国民党员）。由花喜露、于家麟和王觉联系，就把我们的油印《星火》刊物，公开移到《营口新报》副刊上。由花喜露和于家麟组稿和主编，每期出刊之前，把编好的稿件交给在营口的王锡成带给王觉，再由王觉出版。开始《星火》在《营口新报》副刊上每月出一期，由于影响逐渐扩大，根据读者的要求和反满抗日形势的需要，后来就改为半月出一期，一年多时间里，出了二十多期。这是我们活动很有成效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星火》社同人更多了，分布在好多地区：有哈尔滨的、双城的、奉天的、本溪的、海城的、营口的、复州湾的。以我们盖县人为最多，以盖县为活动中心。我记得名的就有四十多人。还有不少《星火》社同人的亲戚、朋友、同学及学生同情支持我们的活动。《星火》这个刊物的读者，虽不能确知多少，但也可以想见是

很可观的。

这时，《星火》社同人的活动，已经对敌伪构成了威胁，所以也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和敌视。我们的活动必须更加谨慎和秘密了。为了蒙蔽敌伪特务，有的同人来找于家麟时，就先到香铺找我，以“做买卖谈生意”的身份出现在香铺里，再由我晚间找于家麟到香铺来会面。有时必须几个人集会时，也是以游山玩水的形式，坐在一起摆出谈天说地的样子来迷惑敌人。这样，我们在凶恶的敌人的眼皮底下照样活动着。

一九四一年，花喜露突然被伪盖县教育局宣布为赤色嫌疑分子，勒令离开黄旗堡小学。以后他就不知去向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和葛雷一起到了奉天（沈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找到了新的工作，在奉天大东区公所做办事员。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继续进行反满抗日活动。

这时以于家麟为首的一些《星火》社同人，接受了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并在一九四一年秋经王觉和任复州湾盐务局长的李光海介绍，于家麟和我加入了国民党。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星火》社的同人不分党派，积极合作，进行反满抗日斗争。一九四一年以后，日伪特务活动更加猖獗，他们的魔掌已伸向《星火》社同人。除了花喜露被迫离开盖县以外，王觉也被敌特注意上了，他也不得不离开营口，与《星火》社另一同人李光海一起跑到了伪新京（现在的长春市）。从此《星火》停办了。但《星火》社同人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不久，一个坏消息传来：在伪新京的王觉和那里的《大同报》副刊编辑李季斌（他也是国民党员）一起被捕了。在伪新京的李光

海、石岱宗等就逃亡流落到关内。李光海在全国解放以后，到过沈阳我的家里，我对他的情况才有所了解：他逃到关内后，先辗转到了重庆，后来又到了延安，继续进行抗日斗争。北京和平解放后他到了北京，在卫生部工作，文革中去世。

一九四二年夏天，于家麟去伪新京联系同人，了解到日伪特务大肆逮捕爱国人士的情况。回来后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在作垂死挣扎，它的魔爪由中国伸到了东南亚，又由东南亚伸向太平洋，制造了“珍珠港事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进一步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它已走上了穷途末路。可是它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对占领区进一步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所以在东北已经开始了大逮捕。于家麟告诉我们：“今后的活动要更加谨慎，更加秘密。但是决不能停止活动，敌人越疯狂，越说明了它的虚弱。”所以当时我们研究了，在《营口新报》上的《星火》副刊不能出版的情况下，要另辟蹊径，建立新的阵地。我们《星火》社同人就深入盖县一高和二高联系进步学生，在这两个学校里创办新刊物。在盖县一高以李昌毓为首的同学们创办了《大地》，在二高以臧永昌为首的同学们创办了《辰星》，继续发表反满抗日的爱国文章。

一九四三年秋天，为了扩大活动阵地，于家麟就找到了邻近的几个《星火》社同人研究，打算成立一个书店，暗中传递革命进步书刊，更多地联系同人，推动反满抗日斗争的发展。就在中秋节的夜晚，于家麟、王锡成、张克恩、李昌毓、臧永昌和我，聚集在王克范所在的盖县永安

屯小学校，以仲秋赏月为名，蒙蔽敌伪特务的耳目，讨论了成立书店和以后如何活动的问题。我们一直议论到深夜，最后决定在盖县城内大堆子，开设了一个租书卖书的书店。我们租了“道德会”旁边的一间门市，请退职老商人李勤甫出面经营。取名叫“秋灯书店”，意寓在黑暗的社会里给人们以光明。表面上出卖出租《三侠剑》、《七侠五义》、《金粉世家》等书；暗地里收集、传递革命进步书刊。比如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巴金的《灭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尔基的《母亲》，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等等。又把《星火》社同人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到“鲁迅文学研究会”进行活动。于家麟和我研究了“读书研究会”分工：由于家麟总负责，王锡成做采购书刊和对外联系工作。李昌毓作一高的负责联系人，臧永昌作二高的负责联系人，侯庚芝作三高（女高）的负责联系人，我为社会青年的负责联系人。以“秋灯书店”为据点开展活动。这个时期馥馨香铺是一个秘密联系和活动的据点。因为我是香铺的会计，于家麟是香铺的股东，我们在香铺研究事，谁也不会怀疑。外地和其他《星火》社同人，要找于家麟，就扮成商人的模样，以做买卖的名义到香铺来，使敌伪特务很难看出破绽。所以这个时期活动比较频繁，也比较顺利。当时香铺的大掌柜胡乾一老先生（他是盖县现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垂元的祖父），是一个同情和支持反满抗日爱国活动的开明人士。他知道我们的一些活动，不但不阻拦，还提供了许多方便。后来《星火》社同人被捕，胡乾一老先生也受到了敌伪特务的

刁难和摧残。

一九四三年深秋的一天夜里，两年前在伪新京被捕的《大同报》副刊编辑李季疯，突然来到盖县，到香铺找到了我，说要见于家麟。当天晚上我把于家麟找到香铺。李季疯告诉我们：他是从伪新京的日本监狱里逃出来的，要求我们设法掩护他。他向我们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监狱里如何惨无人道，如何迫害革命人士。和他一起被捕的王党，已经被折磨死在敌人监狱里了。又告诉我们：他从敌人的审问中知道，日伪特务已经注意到盖县反满抗日的《星火》社组织，并把于家麟、花喜露、门文东等列入了黑名单，要我们严加防范。于家麟和我们几个《星火》社同人，就把李季疯掩护起来，让他住在我们对门的张克恩家里，因为张克恩的家属没搬来，比较方便。我们又为他拔掉了有面貌特征的大包牙，使他改变脸型，让别人不易认出他来。可是事不凑巧，没到一个月，张克恩工作的伪兴农合作社仓库被盗，张克恩本人被伪警察局监禁起来。日伪特务要到天台街张克恩家里来搜查。我们得到消息后，怕暴露李季疯，就赶紧把他送到海城曲舒雨家，最后由王锡成把他送到沈阳花喜露家里，求花喜露设法掩护他，花喜露当时就答应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花喜露这时已经是地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把李季疯转移到一个矿山上隐蔽起来。虽然李季疯、于家麟和我都是国民党员，但为了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是认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帮助了国民党人的抗日活动，为国民党人解决了困难。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诚意。当时花喜露对王锡成说：“你们把李

季疯交给我吧，不过为了防止意外，希望你们今后就不要再和他接触了，以免暴露。”后来李季疯又出来活动，再次被日伪特务抓进了监狱，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和我们一起被营救出狱。出狱后我们和他见面时，他已经是疯疯颠颠的了，经常骂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当年的冬天他在沈阳小河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花喜露在沈阳被捕入狱了，关押在伪“奉天第一监狱”。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来函，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日本投降后我才知道的）。他在日伪的监狱里经受了八个多月的审讯，被敌人酷刑折磨得昏死过去十多次。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花喜露被捕时，我们在盖县的《星火》社同人并不知道，事先也没得到消息。不过从当时敌特活动频繁的迹象中，我们感觉到空气的紧张。所以在五月初，让王喜成到沈阳去探听一下消息。王锡成一到沈阳花喜露的家里，就感到气氛不对劲。他没看到花喜露，而花喜露的爱人王丹群刚刚分娩六、七天没人照顾。还没等王锡成问，王丹群就急忙告诉他说：“你赶快离开这里，田贻被捕了，我家的周围有特务监视着，你赶紧回盖县通知《星火》社同人快隐蔽起来。田贻临走时说：‘争取捕到我为止，’”王喜成急忙回盖县通知我们，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四四年的五月初，日伪特务在盖县对《星火》社同人开始了大逮捕。有不少人因为我们还没来得及通知到，没等隐蔽就被捉去了。于家麟和我虽然得到王锡成带来的消息，但还没等离开天台街，当天傍晚日伪特务就到了天台街，把于家麟院子的大门堵住。多亏于家麟从

后墙翻出去，跑到香铺告诉了我，我们才分头逃离天台街。日伪特务当时没有捉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属抓进了伪满盖平县警察署关押起来。于家麟的母亲、姐姐、爱人和一个吃奶孩子，我的家里人都被抓去了。王锡成的老岳母也被特务打伤。这就是日伪反动派使用的株连九族的残酷手段。我跑到城东门屯，后来被特务抓到；于家麟跑到东山冯连仲家里，也被特务抓到。就这样没出一个月，在盖县的《星火》社同人大都被捕了。我清楚地记得，在于家麟、王克范被捕后，当天就用布袋子套住了他俩的头，从警察署的院子押出去，送到伪“奉天第一监狱”去了。而我和张吉宽、王锡成、张克恩等三十多个《星火》社同人及一些家属，就被关押在伪“盖平县警察署警务科留置场”里审讯。这时于家麟和我的家属被放回家了，日伪特务这是在耍阴谋诡计，因为他们了解到，有些外地《星火》社同人到盖县来，多半是找到于家麟或我的家，特务想用我们的家属作诱饵，来抓其他人。

这次在盖县被捕的《星火》社同人，还有下列人员：孔庆举、许默语、许庆春、李勤甫、鲁启智、李昌毓、臧永昌、郁其文、杨世绵、李吉升、李吉恒、赵廷魁、张文廷、高玉元、门恩义、王盛伦、于恩惠、周建涛、王德祥、赵怀范、迟金镇、穆玉琪（女）、侯庚芝（女）、姜竞芳（女）、赵俊芬（女）等。还有一些受牵连的人。

经过一段残酷的刑讯之后，剩下的一些家属和受牵连的人也都被放出去了。我们这些《星火》社同人就被送到伪“奉天第一监狱”关押起来，继续刑讯。在将近一年的匪刑拷打逼供中，很多人坚强不屈，在审讯中和敌人进行

了面对面的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痛斥他们残害中国人民，抓劳工，抓“经济犯”，抓“政治犯”，抓“思想犯”等种种罪恶。在伪“奉天第一监狱”里，审讯我的是日本上田警佐和翻译金朝太以及一些打手。他们穷凶极恶到了顶点。有一些刑法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毛骨悚然，可当时都挺了过来。压杠子把迎面骨都要压裂了，直到昏过去才放开。我先后三次被栓着大姆指吊起来，只有脚尖点地，还用皮鞭子抽。我的大姆指因此残废了，关节长死不能活动。每个《星火》社同人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一些同人被折磨死在敌人的监狱里，每当想起他们我心里总是非常难过的。在日伪“奉天第一监狱”里，先后有王克范、许默语、许庆春、门恩义、王盛伦、李勤甫、杨伯甫被折磨死去。最后敌伪以“治安法违反，出版物违反”的罪名，对《星火》社同人中的十一人定罪判刑。其余的人以假释的名义放出来监督。被判刑的十一人有：于家麟、张吉宽、花喜露、王锡成、张克恩、鲁启智、郁其文、李昌毓、迟金镇、臧永昌和我。每个人判多少年徒刑，事先都分别地通知了个人。后来从敌伪的档案材料中看到：于家麟被判处死刑，张吉宽二十年，花喜露、王喜成十五年，其余的十年到五年不等，我被判了无期徒刑。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那天，一早看守警就把我们叫出去，叫我们到候审室去。那个伪警奸笑着说：

“你们的案子出头了，高等法院今天对你们宣判。”我们十一个第一次在敌人的监狱里碰到一起，每个人的脸上即没有笑容，也没有愁容，更没有害怕的样子。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伪警不准我们说话。当时其他人判什么样的

刑，互相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被判无期，估计其他人也轻不了。特别是于家麟，我们都替他担心。他离我较远，我们无法言谈，我看到他的面容消瘦、焦黄，本来就矮小的个头显得更小了。可他的眼睛很有神，多次注目地看着我，似有很多话要说。就这样，我们一直等到中午过后，快到下午一点钟了，也没叫我们去听判决。我们心里都感到奇怪，也有些紧张，不知敌人要耍什么新花样。这时一个伪警走进候审室，又似讨好，又似无可奈何地说：

“你们拣着了。”这个消息尽管在我们的心里早就期望着，并且确信终有一天会到来的；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来得这么凑巧。所以刚一听到，都有点惊愕了。可是在我们惊愕片刻之后，大家全明白。一下子跳起来，喊起来，互相拥抱起来。这时的伪警也夹起尾巴只是说好听的话。有的人当时就想往外走了，那个伪警就再三地表示歉意地说：“还得委屈大家一下，请先回监房，可能需要办些手续才能放。”我们又被送回了监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我们十一位《星火》社同人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营救出狱了。这个胜利是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八年，在东北则是奋战十四年而后取得的。我现在还记得那时爱唱的一支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天涯，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奋战，不息！”花喜露同志出狱时，被敌人折磨的都难以行走了，是《星火》社同人把他背送回家的。由于伤势过重，回家后虽多方求医治疗，终因无效而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不幸逝世，终年三十四